

一个亟待正本清源的概念：科学

——读吴国盛教授新书《什么是科学》有感

“科学”，是当今中国人使用最为广泛、频繁的词汇之一。但是，要弄清什么是科学这样一个问题，看似浅显，却又十分深奥。最近，我有幸读到吴国盛教授的新著《什么是科学》。这是我所读到的最为深入浅出、最能懂得理解，并几乎可以消弭我对“科学”问题的一些疑惑的好书。

本书中，他以科学史的手法梳理了西方和中国的相关历史事实，同时渗透着科学哲学的语言、理念和精神，从而厘清“科学”概念的意义及其发展变迁的进程。

这里仅举吴教授对现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为例做点简要说明。古希腊文化经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传承，到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演绎的、探究事物内在本性的、“自由”而非实用的理性科学。其实，基督教还是比较包容的，它允许教权与王权并存，所谓“耶稣的归耶稣，恺撒的归恺撒”，这样以自由研究学问为主旨的大学能在教权和王权的夹缝中生存繁衍。而后基督教还不满足于“相信”上帝创世，而追求用理性来加以“证明”，从而使古希腊理性科学的地位极大提升，并

产生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经过“唯名论”革命，给人留下了自由探究的无限空间，从而使“现代”科学自由翱翔。

这种革命还使人取代了上帝成为万物的中心，大大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产生了渴望实现自我的自由意志。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体现了他们在希腊理性科学“求真”的基础上添加了“求力”的意志，并导致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大抱负，使现代科学增添了一种“有用之学”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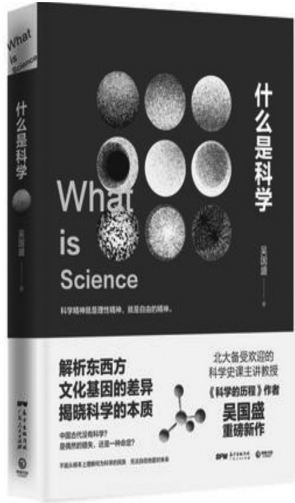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人们还能够对自然进行数学化和机械化的描述——世界图景化。其结果是复杂的自然客体的本性可以被分解为数字和几何图形来加以破译，还原为不同的物质和运动来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就会被分门别类地进行探究和“拷问”，从而使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真正成为了“分科之学”。

其实，“科学”不仅仅只是上述现代科学的主流。它还有被本书作者称之为“另类科学传统”的一面——博物学。吴国盛教授也从辞源考证出发，对这种科

学传统的意义和功能做作了深刻的阐述，并做出了一个“科学”的谱系图。作者梳理了中国“科学”，说明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无科学”相反，“中国古代有科学”，那就是博物学（自然志）。他提出以博物学的眼光来重建中国科学史，并且从天地农医四个方面对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做了梳理，指出了中国古代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日食和新星与超新星的观察记录，它们对当代天文学仍有重要参考意义。

同样，中国古代对地学也有详细的现象描述。但是，彼时中国学者，却未能将自然事物的现象和表观规律与其内在确定性联系起来，反而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它们作为祥瑞与灾异的标志，而与上天对统治者发出奖励与惩罚的信号相联系。

综上所述，“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样化的概念，要用简洁的语言将它归纳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然而，读了本书对当下的中国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科学在中国被接受是由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功利



主义需要，缺乏“求真”与好奇等科学动机，从而难以使科学在本土生根发芽。二、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也会给人类造成生存危机，如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西方人已经有了危机意识；而作为外来文化，中国人却很少有这种危机意识，反而使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盛行，这对中国的发展将构成极大威胁。三、正确认识科学的涵义及其变迁，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知道它有什么、缺什么，从而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自己新文化。

文/王义道

古人读书笔记都记些什么

古人读书、做学问，大都有自己的笔记，这些笔记著作已成为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一段话：“杂说之源处于《论衡》，其说或抒己见，或订俗讹，或述见闻，或综古义，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这段话大致说明了笔记文体的渊源以及它和古人治学之间的关系。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的，宋代以后，文人笔记文体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实，在宋代之前，笔记精品亦不在少数，诸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都为文人笔记的杰出代表。

总的说来，虽然笔记体裁产生较早，但正式以“笔记”二字作为书名的作品为北宋文人宋祁的《笔记》一书，他的《笔记》分释俗、考订、杂记三卷，其中多为正名物、音训，间及文章史事，造语奇隼，论者颇为精详。到了南宋以后，凡是这类书，很多作者都喜欢用笔记做书名，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龚颐正的《芥隐笔记》等。后来，笔记的名称变得多样化了，比较常见的有笔谈、随笔、笔录、札记、杂记……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의《癸辛杂识》、明人陆树声《清暑笔谈》等。

很多古代文人对做笔记都非常重视，如宋人张载曾说：“心中苟有所闻，原便札记，否则还失之矣。”很多读书人在学习中意识到，做笔记不仅可以激发自己勤于思考，更有助于搜集、积累资料，补充记忆的不足，还有不少文人在笔记中不仅记录了读书的心得体会，还写下了个人的思想活动、疑难问题、研究成果等，为日后其他学者研究整理学术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搜狐读书



如今，孩子的教育问题，被放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只是，对于家长而言，难道做一名“虎妈虎爸”是唯一出路吗？

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香港、70年代在日本作为歌手出道的陈美龄，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先后送进美国顶尖名校斯坦福大学，在旁人眼中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母亲。

陈美龄的自我奋斗与教子之道

此次她将自己的教育经验梳理出五十条，集结出版，即为《50个教育法——我把三个儿子送入了斯坦福》。读罢全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是多么严厉的家庭教育方法，也不是如何挑选学区房、择校的经验，而是满满的爱与尊重。

常言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这方面，没有比陈美龄的以身作则更具有说服力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红透半边天时，她放弃地位、金钱远赴加拿大和美国念书。她凭借自己的实力，先后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儿童心理学专业文凭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只因她的父亲从小便教育她“知识变成你自己的，谁也不能夺去它”。

可见，只有父母自己表现出对于知识的尊重和渴求，孩子才会耳濡目染，懂得学习的重要性。相反，我们身边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家长一掷千金为孩子换学区房、请“最好的”家教老师，可自己呢，

从来不读书不学习，这样的硬件投资，又有多大意义？

有意思的是，在书中列出的十一个教育目标中，并没有“考上名牌大学”这一项。相反的，陈美龄的教育目标都是关乎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例如“拥有梦想”、“能自我肯定”、“内心从容”等等。这些目标看似和“考名牌大学”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从培养“人”的角度而言，只要一个孩子从小树立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么他将有相当大的可能收获成功的人生——这里的“成功”是多义的，考上名牌大学固然是，但不是唯一答案。

通读全书，你会发觉陈美龄讲述的不单单是教子之道，更是她自身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投射。其实，如何对待孩子，和如何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这个世界是相通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在孩子身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自己。

新民网 2016.10.18

阅读心理学家的心理

《心理学家的故事》，戴维·霍瑟萨尔著，郭本禹等译，商务印书馆。

《心理学家的故事》是一部“心理学”故事书，它以心理学的发展演进为脉络，以传记体的形式，结合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图片，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呈现了改变心理学的一位位“完整”的心理学家。

书中追踪伟大思想和发现的点滴起源，写了大量心理学家的逸闻趣事，诸多名人间阴差阳错的恩怨与纠葛，以及心理学各流派纷繁复杂的演化与师承。这样一部堪比小说的心理学

八卦史，生动展现的是你所不知道的心理学发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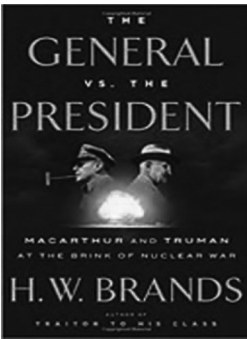
作者霍瑟萨尔赋予了历史人物以灵魂和血肉，不仅描述了心理学家的成功，也描述了其失败，以此力图还原每一位心理学家的生活细节及其职业生涯中所发生的细小而重大的事件，向读者展示心理学家的动机与人格、成功与失败以及好运与不幸等偶然事件是如何促进其新观念、新理论、新研究产生的，并最终编织成为一幅描绘心理学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 《解放日报》2016.10.22



《将军VS总统》：核战边缘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

著名历史学家H·W·布兰兹在新书中带来了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如何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美国未来的故事。

正值朝鲜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杜鲁门总统犯了一个震惊全球的错误。在接受记者关于是否可能会针对中国介入战争而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冒失地说，“战场上的总司令有权使用核武器，正如他以往也有权。”这句话暗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手指正放在核武器的扳机上。当然，错误很快就得到了修正，但伤害已经造成。



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面临苦苦挣扎的经济形势，满目疮痍的欧洲，以及与苏联日益紧张的关系，没有一个问题容易解决。而麦克阿瑟将军则相反，是美国历史上人气最高的一位军人。他从二战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绥靖政策将导致灾难，与共产党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而且越快越好。

作者H·W·布兰兹是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因《美国第一人：本杰明·兰克林的生活和时代》而成为普里策奖候选人。

《文汇报》2016.11.14 文/峻岭